

柒、

歷史意識與二十一世紀海峽兩岸 關係的展望

一、前言

21 世紀東亞地區所面臨的重大課題之一就是：臺灣與中國大陸的關係如何調整？這個課題不僅影響臺灣兩千多萬居民的福祉，帶動中國大陸未來的發展，而且也牽涉 21 世紀亞洲地區的和平與安全。由於這個課題的重要性、複雜性及其不確定性，所以各方人士所提出的看法出入甚大，見解不一，而且各是其是而非其所非。在各形各色對海峽兩岸關係的展望之中，「統一」與「獨一」形同光譜的兩極。在這兩個極端之間，存有各種程度的不同，強度互異的統獨論述，甚至也有「統中有獨」或「獨中有獨」的各種主張。但本文為分析的方便，也為突顯問題之所在，所以只討論作為「理想型」(Ideal type)的(1)「急統」與(2)「急獨」這兩種論述：

- (1) 臺灣應在相對短的時間內，尋求與中國大陸達成統一。在這個大前提之下，所餘尚可討論者僅統一之方法與步驟而已。
- (2) 臺灣應儘快擺脫中國大陸的糾葛，向建立獨立的新國家的方向邁進。

歷次在臺灣社會所進行的民意調查數據顯示，「急統」和「急獨」都不是主流民意，¹但這兩種論述各有若干大同小異的次級論點，亦各有其信從者，各方人士在言論市場上披掛上陣，雖然聲析江河，旌旗蔽空，主客相搏之際山川爲之震眩，但是爭論愈多而終不免於論者治絲益棼，聽者則索解無由，因此，雖然有學者預測可預見的時間內海峽兩岸大致仍平穩，²我們對這兩種極端的立場仍有加以討論的必要。

以上這兩種關於臺灣與大陸未來關係的展望的論述，各有其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之理由，雖然其實質主張互不相容，形同水火，但兩者異中之同則是：兩者都是基於某種「焦灼的不確定感」，都希望舉起亞歷山大（Alexander the Great, 356-323 B.C.）的寶劍，砍斷「哥地安結」（西諺所謂 "to cut a Gordian Knot" ），以最簡捷快速的方法解決長期歷史積澱所造成的問題。如果扣緊這兩種論述都相當缺乏時間深度這項特質來看，我們不妨稱前者爲「急統派」，後者爲「急獨派」，兩者都較少從深遠的歷史意識的角度來思考海峽兩岸未來的關係。

本文無意也無法在有限的篇幅裡，全面地討論海峽兩岸關係展望這個包羅萬象，而充滿變數的重大問題，我只想集中在「歷史意識」這個焦點之上，分析「急統派」與「急獨派」這兩種論述的內在問題，以作爲展望海峽兩岸關係的參考。本文除第 1 節「前言」交代本文主題之外，第 2 節指出 4 百年來臺

¹ 參看：<http://www.mac.gov.tw/mlpolicy/pos/9101/9101.htm>

² Ralph N. Clough, "Taiwan-PRC Relations," in Robert G. Sutter & William R. Johnson, eds., *Taiwan in World Affairs*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1994), p.233.

灣史的主題之一乃是臺灣對中原的離心力與向心力的拉鋸戰。臺灣與大陸未來的關係，應該放在「離心力／向心力」的互動這個歷史脈絡中考量。第 3 節討論「急統派」人士的主張，因為未能正視臺灣史所形成的歷史意識，所以不能免於喪失臺灣主體性的危機。第 4 節接著分析「急獨派」對海峽兩岸關係的展望，忽視了近百年來中國史所形成的歷史意識與民族主義情緒，因不免過度膨脹臺灣主體性。本文第 5 節從歷史的角度，對於海峽兩岸關係的展望，提出一種新的思考視野；最後一節則提出結論性的看法。

二、臺灣史的主題：離心力與向心力的拉鋸戰

自從漢人移民進入臺灣以來，有文字記載的臺灣史雖然較悠久的中國史為短，但是，由於複雜的族群關係、商賈往來、文化交流、政權遞遭等因素的輻輳作用，臺灣史的內涵與面向都極為繁複，因此，研究者解釋臺灣史的論點也不一而足。舉例言之，現階段學術界對戰後臺灣的發展，就有各種不同的理論，古典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從市場經驗立場解釋「臺灣經驗」，有激進派學者從「依賴理論」(Dependency Theory)或「世界體系理論」(World System Theory)加以解釋，也有保守派學者從地緣政治的、社會文化的及歷史的長期因素解釋「臺灣經驗」。³對於戰後臺灣歷史，就有各種不同理論「橫看成嶺側成峰」；對

³ 關於各種論述最新的綜合討論，參看：Edwin A. Winckler and Susan Greenhalgh, "Analytical Issues and Historical Episodes," in Edwin A. Winckler et. al. eds., *Contending Approaches to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aiwan* (New York: M.E. Sharp, Inc., 1988), pp.3-19.

於整個臺灣史的解釋，更可以因為解釋者之立場而有互異之見解。我在這一節中想提出的看法是：(a) 臺灣史的主題之一，就是臺灣與中原的離心力與向心力的拉鋸戰。所謂「離心力」是指臺灣作為中原漢人移民的海角樂園，一直存有強烈的拒斥中原專制政權，追求自由新生活的內在動力而言；所謂「向心力」是指中原是臺灣居民文化的故土，所以臺灣居民對中原文化具有某種孺慕情懷而言。(b) 由於歷史進程中「離心力」與「向心力」的推擠作用，以及臺灣與大陸之間的政治史的斷裂，所以臺灣居民的理想與現實之間，形成某種撕裂性乃至緊張性。我們在下文中闡述以上這兩項論點。

(a) 「離心力」與「向心力」的交互作用與推擠，是4百年來臺灣史的一大主題，這項歷史的主題在歷史思想與文學創作中，以最深切著明的方式呈現出來。

首先，我們從歷史角度來看，鄭成功這個歷史人物在臺灣人的歷史思維中的形象，很能夠彰顯臺灣史進程中「離心力」與「向心力」的拉鋸。鄭成功（名森，1624-1662）在1662年5月8日以39歲英年逝世於臺灣，他的歷史悲劇是由他的歷史角色所決定的。從一方面來看，公元1653年南明永曆皇帝封鄭成功為延平郡王時，曾制書期望他要「作砥柱於東南，繁遺民以弁冕」，⁴南明政權期許鄭成功延續大明政權正統命脈於海外孤島。但是從另一方面來看，則鄭成功率領部眾開拓臺灣，又有告別舊大陸開創新局面之涵義在焉。公元1661（明永曆15）年，鄭成功曾對他的部將說：「我欲平克臺灣，以為根本之地，安定

⁴ 楊英：《從征實錄》（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8），頁39。

將領家眷，然後東征西討，無內顧之憂，並可以生聚教訓也」，⁵荷蘭通事何斌獻臺灣地圖給鄭成功時說：「臺灣沃野千里，〔…〕十年生聚，十年教訓，而國可富，兵可強，真足與中國抗衡也」，⁶從以上的論點看來，鄭成功及其部將對攻佔臺灣一事的認知，顯然「開創」的意義遠大於「恢復」。鄭成功的一生具體顯示他的反清復明事業的困境，他北伐失敗，閩南不保，只好攻佔臺灣以為復興之基地，但一旦久駐臺灣必為日益壯大之「離心力」所困。鄭成功在歷史上正是處於臺灣與中原之間「向心力」與「離心力」拉鋸戰的中心點之上。1680年鄭成功的兒子繼承遺志反攻大陸失敗無功而返，被母親董太妃痛罵一頓。這件史實很能顯示鄭氏政權在歷史的「向心力」與「離心力」推擠之下「進退失據」的處境。陳昭瑛曾指出鄭氏政權的兩難

⁵ 同上書，頁184-185。

⁶ 江日昇：《臺灣外紀》（臺北：世界書局，1979），頁191。史學界過去對鄭成功到底是「恢復」中國固有領土臺灣，或是「開創」移民之新土，頗有爭議。楊雲萍認為鄭成功不是「恢復故土」，參考楊雲萍：〈鄭成功的歷史地位——開創與恢復〉，收入黃富三、曹永和編：《臺灣史論叢》（臺北：眾文圖書公司，1980），頁99-104；黃典權、盛清沂則從「恢復故土」的角度論鄭成功，參看黃典權：〈鄭延平臺灣世學〉，收入：《臺灣史論叢》，頁105-124；盛清沂：〈明鄭的內治〉，收入：《臺灣史論叢》，頁125-162。其實，從鄭成功的歷史角色來看，他可以說是「開創」與「恢復」兼而有之。鄭成功由於他的歷史角色的獨特性，所以成為許多歷史小說的重要題材，參考二宮一郎：〈鄭成功に題材をとった歴史小説について〉，《臺灣史研究》第9號（1991年3月31日，臺灣史研究會），頁43-46。另外，1987年7月18日至22日，廈門大學臺灣研究所主辦《鄭成功國際學術會議》，也有多篇論文討論鄭成功的歷史評價問題，參考松田吉郎：〈鄭成功研究國際學術會議に参加して〉，《臺灣史研究》，第7號（1989年2月10日），頁9-13。

困境在於：⁷

一方面中興明室是鄭氏在臺政權的合法性基礎；另一方面，符合中興明室的出兵大陸之舉卻造成民窮財困，使其在臺政權出現危機。遺民政府之難為正在於此。

這種說法一針見血地指出鄭氏政權的歷史角色及其困局。

在鄭成功這個歷史人物身上，我們具體地看到了臺灣歷史中「向心力」與「離心力」的拉鋸戰，但是，我們必須說明的是，「離心力」的產生乃是因為「向心力」沒有著力點，難以落實，而不得不另謀出路所致。在今日臺南市的鄭成功廟高懸著一幅清末巡撫沈葆楨（翰宇，1820-1879）的輓聯，很能說明這種兩大歷史力量拉鋸的實情：⁸

開萬古得未曾有之奇，洪荒留此山川，
作遺民世界
極一生無可如何之遇，缺憾還諸天地，
是創格完人

上一聯所講的是鄭成功率領閩粵移民進入臺灣這個美麗之島，創建一個嶄新的「遺民世界」，以揮別舊中國專制的夢魘；下聯所感嘆的是，鄭成功及其子民所開發的臺灣，終於仍被大清帝

⁷ 陳昭瑛：〈明鄭時期臺灣文學的民族性〉，《中外文學》第22卷·第4期（1994年三月），頁40。

⁸ 夏琳：《閩海紀要》（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8），頁30。

國收回納入版圖，這種歷史的「缺憾」使天地為之含悲，風雲為之變色。鄭成功的父親鄭芝龍（?-1661）被清廷扣留在北京，貽書鄭成功要求他的兒子與滿清議和，但鄭成功不為所動，回信拒絕。鄭成功之所以臨死時自嘆「忠孝兩虧」，主要原因乃是因為他輾轉呻吟於臺灣歷史的「向心力」與「離心力」兩大力量的擠壓之下，他在臺灣的統治實具有強烈的雙重性格，一方面「是以臺灣為家、為國，故連橫稱其述鄭成功開臺事蹟為『建國紀』；另一方面，是鄭成功以臺灣為濃縮的中國，治臺之終極目的，是將臺灣這一濃縮的中國地圖放大為真實的中國土地」，⁹後者是「向心力」的表現，前者是「離心力」的一種表徵。鄭成功就是在這兩大力量所形成的矛盾中無可如何地完成了他的歷史悲劇。

「離心力」與「向心力」兩大力量的拉鋸，不但表現在鄭成功這個歷史人物身上，也表現在臺灣的文學作品之中。自從17世紀以來，移民臺灣的中原文人學士甚多，在他們的詩文作品中，常常呈現出「思歸」與「長留」之間的心理掙扎，我們各舉一首詩作為代表。

原籍浙江鄞縣的沈光文（文開，1612-1688），在他的詩作中充滿對原鄉的眷戀，以下這首詩頗具代表性：¹⁰

歲歲思歸思不窮，泣歧無路更誰同。

蟬鳴吸露高難飽，鶴去凌霄路自空。

⁹ 陳昭瑛，前引文，頁36。

¹⁰ 連橫：《臺灣詩乘》（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0），頁7-8。

青海濤奔花浪雪，商飆夜動葉梢風。

待看寒雁南飛至，問訊還應過越東。

詩中首句「歲歲思歸思不窮，泣歧無路更誰同」，表現的是早期移民心靈深處眷戀原鄉，飽受「向心力」的拉扯的痛苦。但同時代來臺原籍江蘇華亭的徐孚遠（1599-1665），在他的〈桃花〉詩中，所表現的是完全不同的情懷，詩曰：¹¹

海山春色等閒來，朵朵還如人面開；

千載避秦真此地，問君何必武陵回！

這首詩中字裡行間所透露的是移民對新土臺灣的擁抱，他們將臺灣這塊蓬萊仙島當作是避秦的勝地，拒絕專制中國的海角樂園。「問君何必武陵回」，臺灣史中臺灣居民對中原的「離心力」在此表現無遺。

綜上所說，不論是從鄭成功這個歷史人物的角色來看，或是從臺灣文學作品的內容來看，¹²臺灣歷史與文化中對中原同時具有「離心力」與「向心力」，而且兩者互相拉鋸，確實是幾百年來臺灣歷史與文化的一大主題。

(b).但是，以上所說的「離心力」與「向心力」的交互作用，是在具體而特殊的臺灣歷史情境中拉擠進行的。臺灣歷史的發展數百年來有其獨特性，歷經荷蘭（1624-1661）、明鄭（1661-1683）、滿清（1683-1895）、日本（1895-1945）與中華

¹¹ 同上書，13-14。

¹² 以上關於明鄭時期臺灣文學的討論，參看：陳昭瑛，前引文，頁 38-43。

民國政府（1945-）的統治，政權遞嬗，物換星移，滄海桑田，統治主體不斷更迭正是臺灣政治史的一大特徵。在 1895 年割讓臺灣之後，臺灣與大陸完全脫離，「離心力」快速發展並與「向心力」的拉扯作用，於是就形成了臺灣居民的理想與現實之間的不重疊性。

理想與現實的不重疊性作為一個歷史現象開始於公元 1895 年臺灣之割讓給日本。在割讓之後，臺灣人的理想與現實之間出現了分裂，李春生（1838-1924）是一個具有代表性的個案。李春生原籍福建廈門，家境清寒，幼年時隨父領洗入基督教，後來在洋行學習，自修英文有成，成為英國洋行助手，他的事業受到太平天國之亂事的影響，遂在 1865 年 29 歲時由福建渡海來臺。李春生來臺灣以後，先在寶順洋行任買辦，不久又代理和記洋行的採購，後來自己經商，首先大力推廣北部烏龍茶的種植及銷售，同時採多元化的經營，成為臺北有名的富商。1895 年又成為臺灣第一位石油進口代理商。在政治上，他的一生橫跨了兩個政權，在各個政權下都曾參與過政治，先是參與臺北城以及基隆新竹間鐵路之建築，1895 年又在政權交替之際，扮演過重要角色，特別是在重建臺灣的秩序上出力甚多。我在研究李春生的國家認同時發現：在 1895 年以前，李春生雖有強烈的中國文化認同，但是卻不像當時許多中原地區儒生士大夫一樣地對大清政權懷有強烈的歸屬感。作為一個從大清帝國子民轉變為日籍華人的李春生，在政治上雖認同於日本帝國，但在文化上仍以中華文化與中華民族作為認同對象。¹³

¹³ 參考黃俊傑、古偉瀛：〈新思與舊義之間—李春生的國家認同之分析〉，收

李春生在臺灣政權轉換之際所表現的理想與現實的撕裂，其實是最近一百多年來臺灣人，尤其是臺灣知識份子，處理認同問題的共同態度。但是，臺灣知識份子對中原文化理想上的認同是抽象的，而一涉及政治到具體而現實層面上的政權。就會在「抽象的」與「具體的」之間造成落差，甚至互相矛盾。這種落差或矛盾，正是臺灣知識份子痛苦的重要根源之一。我們以日據時期若干知名的臺籍知識份子為例加以闡明。

日據時代追隨臺灣大地主林獻堂甚久的葉榮鐘（1900-1978），在他的回憶錄中，對他的理想中的「祖國」曾有這樣一段自剖之言：¹⁴

〔…〕我們出生於割臺以後，足未踏祖國的土地，眼未見祖國的山川，大陸上既無血族，亦無姻親。除文字歷史和傳統文化以外，找不出一點連繫，祖國祇是觀念的產物而沒有經驗的實感。但是我們有一股熱烈強韌的向心力，這股力量大約就是所謂「民族精神」。〔…〕我們觀念上的祖國，到底是怎樣的國家，我們對祖國的觀念，由歷史文字而構成的，當然佔有相當的分量，但還不及由日本人的言動逼迫出來的切實。當我們抵抗日人的壓迫時，日人一句共通的恫喝就是「你們若不願意做日本國民，返回支那去好了。」緣此日人的壓迫力愈大，臺人孺慕祖國的感情也就愈切。假使日人在這五十年的統治期間，能夠切切實實施行所謂「一視同仁」的政策，

入李明輝編：《李春生的思想與時代》（臺北：正中書局，1994）。

¹⁴ 葉榮鐘：《小屋大車集》（臺中：中央書局，1977），頁 212-213。

不歧視，不欺凌，那末臺人的民族意識，或不致如此強烈。因為言語、文字、風俗，習慣以至於歷史文化，雖然也是民族的紐帶。但是最要緊的仍是要看是否利害一致，機會均等。

這一段自述很正確地告訴我們，日據時代臺籍知識份子所抱持的中原文化的理想同「是在日本殖民主義者的壓迫之下，逐漸形成的一種對抽象的文化祖國的感情。本省著名作家吳濁流（1900-1976）對這種抽象的情感有更進一步的描寫：¹⁵

眼不能見的祖國愛，固然只是觀念，但是卻非常微妙，經常像引力一樣吸引著我的心。正如離開了父母的孤兒思慕並不認識的父母一樣，那父母是怎樣的父母，是不去計較的。只是以懷戀的心情愛慕著，而自以為只要在父母的膝下便能過溫暖的生活。以一種近似本能的感情，愛戀著祖國，思慕著祖國。這種感情，是只有知道的人才知道，恐怕除非受過外族的統治的殖民地人民，是無法了解的吧。

吳濁流所說的這種「眼不能見的祖國愛」，是一種抽象的感情，是一種以漢民族為對象的「文化理想」，吳濁流又說：¹⁶

臺灣人具有這樣熾烈的鄉土愛，同時對祖國的愛也是一

¹⁵ 吳濁流：《無花果》（臺北：前衛出版社，1988），頁40。

¹⁶ 同上書，頁39。

樣的。思慕祖國，懷念著祖國的愛國心情，任何人都有。但是，臺灣人的祖國愛，所愛的決不是清朝。清朝是滿洲人的國，不是漢人的國，甲午戰爭是滿洲人和日本作戰遭到失敗，並不是漢人的戰敗。臺灣即使一時被日本所佔有，總有一天會收復回來。漢民族一定會復興起來建設自己的國家。老人們即使在夢中也堅信總有一天漢軍會來解救臺灣的。臺灣人的心底，存在著「漢」這個美麗而又偉大的祖國。

這一段自述很明白地顯示：臺灣人心目中的「漢人之國」，是指漢民族所創造的文化。臺灣人認同於這種理想中的漢民族的文化，他們不認同「滿洲人的國」，他們在日據時代也不認同於日本帝國。但是，當他們從文化的、抽象的「漢人之國」，跨入了政治的、具體的、現實的中國政權時，理想與現實的強烈對比立即使他們的祖國夢為之破碎，吳濁流這樣自述他第一次抵達大陸的感受：¹⁷

登陸後，我發覺到一句話也聽不懂。雖是自己的祖國，但予人感受卻完全是外國。〔…〕往南京的火車，擠得實在可怕。乘客排成長蛇陣，在接受煩瑣的檢查。我是日本籍，所以在另一個檢查處，亮出護照即放行，東西也沒有檢查。上海站被炸毀，僅有臨時蓋的房舍。鐵路是寬軌，車廂比臺灣的寬大，乘客們個個攜帶大量包袱，沒有行李的非常罕見。沿途所有車站也都是隨時站房，

¹⁷ 同上書，頁 120-123。

顯示往日的激戰，所見皆荒涼，比上海的繁華恍同隔世，上海儼然是列強榨取的中樞，很多銀行、會社等高樓大廈，建築的豪華令人吃驚，而住在租界的外國人，其妄自尊大，其旁若無人，更令人憤慨。

只不過三四天的見聞就使我深感做一個中國人的悲慘。洪水般的野雞，乞丐的奔流，都是為求生存的人們的可憐影子。相反地，外國人都是暴君，橫蠻不可理喻，正是支配者的一副嘴臉。

吳濁流一接觸到他夢寐思之的祖國大地，他的祖國夢立即破碎。映入他的眼簾的是大陸在抗戰期間飽受日本鐵騎凌虐下的斷井殘垣，是中國社會的落伍與黑暗，是人性尊嚴的被外國帝國主義者無情踐踏。這種理想與現實的差距，是每一個臺灣人初次接觸中國大陸時最深刻的印象。彭明敏（1923-）曾回憶他的父母初遊大陸時的感受說：¹⁸

我大約五歲的時候，曾被帶到中國。我仍記得上海有多冷，也記得南京中山陵的長階梯。〔…〕這次旅遊卻給父母一個機會，將大陸中國人與被日人統治了幾十年的臺灣人的生活情況，作一比較。當然，他們對中國的廣大，印象深刻，對祖先的土地，也感到有些鄉愁。不過，就社會發展、工業化、教育和公共衛生方面來說，他們覺得比起臺灣，中國還有許多有待改善的。

¹⁸ 彭明敏：《自由的滋味》（臺北：前衛出版社，1988），頁 28-29。

臺籍知識份子接觸到具體而真實的「政治中國」時，舉目所見現實中的景況，使對漢民族文化懷有孺慕之情與崇敬之心的臺灣知識份子無法接受。文化的理想與與政治的現實之間巨大的落差造成了臺灣人心靈中痛苦的掙扎。

總結以上的分析，我們看到：臺灣對中原的「離心力」與「向心力」之間的拉鋸戰，是近 4 百年來臺灣歷史與文化中的一大主題。這項潛藏在臺灣歷史文化中的主題，表現而為臺灣人的政治現實（認同於非漢族統治者）與文化理想（認同於漢文化）之間的撕裂與矛盾，使他們在歷史的狂流中痛苦掙扎。本文所探討的 21 世紀海峽兩岸關係的問題，必須在以上這個歷史的脈絡中加以考察。

三、「急統派」主張的盲點及其危機

現在，我們首先討論「急統派」人士對海峽兩岸關係的主張。這一派人士認為臺灣應儘快與大陸統一，這種主張可以以各種不同的論述方式提出，其中較為常見的是以下兩種論述：

第一，從民族文化觀點著眼，認為臺灣是中華民族「神聖的領土」，是不可分割的組成部份，因此應早日統一於一個中國政權之下。

第二，從經濟觀點著眼，認為臺灣與大陸在經濟上有其互利互補之處，因此應早日求其統一，以建立華人經濟共同體。

這兩種論述前者著眼於歷史文化傳統，後者從現實經濟利益立論，訴求互異，但立場一致。反對這一類論述的人，也很容易從特定立場加以反駁，例如反對第 1 型論述的人，可以指

出近代國家形成的要件並不是歷史傳統或文化習俗，而是共同的休戚與共的命運；他們也可以指出近代世界許多國家（如美國）並不是在「政治認同」與「文化認同」合一的基礎上建立國家這項事實。針對第 2 型論述，反對的人士也可以舉出種種論據，說明臺灣是屬於亞太經濟圈的海岸型經濟體，與中國大陸的大陸型經濟體並無交集之處。但是，我在這裡並不企圖一一討論這兩種論述方式及其反駁者的論點。我只想從歷史意識這個角度，指出：以上這兩種型態的「急統派」論述，都因為忽略了漢人移入臺灣島以後 4 百年來臺灣人的歷史意識之特質，所以陷入歷史的盲點而不自知。我們接著闡釋以上這項論點。

我們在本文第 2 節曾指出：臺灣史的一大主題是臺灣對中原的「離心力」與「向心力」的拉鋸戰。由於「離心力」的作用，4 百年來臺灣的重要角色之一就是作為漢民族拒絕異族專制政權，追求自由幸福的海角樂園。從明鄭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分批從大陸移居臺灣的漢人，心靈深處都有一個夢——他們抗拒異族專制，追求自己當家作主的自由生活。所以，臺灣的民主運動常常和民族運動互有重疊，日據時代更是如此。

臺灣居民這種拒絕作異族專制政權的奴隸，追求自由生活的夢，深深地潛藏在臺灣歷史的「離心力」之中，而構成為臺灣人的「共同記憶」。大量的文獻資料都可以印證上述看法。舉例言之，著名作家吳濁流對臺灣人的性格就有一段深刻的觀察，他說：¹⁹

¹⁹ 吳濁流：《無花果》，頁 210。

臺灣人本來就是臺灣的歷史和環境下所產育的，所以自然而然會具有一種特異性。不用說，祖先是漢民族。每當地方的異族侵入中原時，作戰到最後，然後戰敗而退往南方，或是不向異族的政權屈服而逃到南方來，這些人大部分都落籍在福建和廣東。當他們感到政治的壓迫時，就為了謀求自由的天地而向海外發展。這些人就搬到臺灣或南洋當華僑了。因此，不管任何人都是屬於漢民族中最不屈服異族的人們。他們不但在大陸奮鬥過一番，到了臺灣又更加磨練了一番。後來成為清朝國土後，仍舊不願接受異族而做了多次的叛亂。因此，滿清就說臺灣是「三年小亂，五年大亂」而叫苦連天。

臺灣人在歷史上之所以屢次起兵抗拒中原專制政權，就是爲了吳濁流所說的「謀求自由的天地」。這種追求自由自主的意志，到了 1895 年日本統治臺灣之後，更是爲了抵抗日本殖民主義者而快速發展，彭明敏在回憶錄中這樣說：²⁰

父親和我們這一代，成千受良好教育的臺灣人始終支持臺灣自治運動。他們首先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組織起來，因為美國總統呼籲世界承認少數民族權利而受到鼓勵。在整個 1920 年代，臺灣人領袖不斷要求日本政府讓臺灣人參與臺灣的行政和立法，到了 1935 年，日本政府不得不開始讓步。由地方選舉成立地方參議會，投票權逐漸擴大。1945 年初日本政府終於宣佈臺灣人可與日本

²⁰ 彭明敏：《自由的滋味》，頁 72。

人享受同等的政治權利。

從 1921 年起至 1934 年止的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就是一種「自治運動」，反對日本殖民主義者所推動的同化主義。²¹也是同樣在追求自主的歷史脈絡下，日據時代文化運動的前輩洪石柱，在光復初期呼籲國民政府早日讓臺灣回歸「省制」。²²也只有在同樣的歷史脈絡中，我們才能確切瞭解 1993 年 12 月 10 日臺灣教授協會等 23 個團體，在大陸海協會代表來臺北參加會議前夕，所發表的意見書的真正意義。這件意見書結論說：²³

總之，臺灣人民有權利決定臺灣前途，選擇自己的生活方式。任何政權如果要長遠地得到臺灣人民的支持，就必須認同臺灣，與斯土斯民結成「臺灣命運共同體」。

要求「選擇自己的生活方式」，這正是 4 百年來臺灣歷史中的「離心力」所孕育的臺灣居民的共同希望。

隨著戰後臺灣經濟的快速發展與中產階級的茁壯，以臺灣為主體的意識日益甦醒。作為「臺灣主體性」覺醒的一項重要指標的，就是 1987 年 7 月戒嚴令廢除以後，在知識階層中逐漸形成的一種以臺灣為中心的世界觀。其實早在日據時代，臺籍知識份子吳新榮（1907-1967）醫師，就已提出一種雛形的以臺

²¹ 參考周婉窈：《日據時代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臺北：自立報系文化出版部，1989），頁 183。

²² 關於洪石柱的言論，參見鍾逸人：《辛酸六十年》（臺北：自由時代出版社，1988），頁 364。

²³ 見：《自立晚報》，1993 年 12 月 12 日，第 14 版。

灣為中心的世界觀。吳新榮在 1941 年 8 月 10 日的日記中如此記載：²⁴

²⁴ 吳新榮：《吳新榮日記（戰前）》（臺北：遠景出版社，1981），頁 112。吳新榮在 1943 年 12 月 3 日在《興南新聞》發表一首題為〈獻給大東亞戰爭〉的詩云：

我……站在新高山上思索
東臨渺渺太平洋
西挖茫茫亞細亞大陸
北繫神州日本列島
南顧熱國馬來群島
啊本島 咱臺灣
東亞的中心 世界的關口
……
我 站在新高山上瞭望
那邊麥哲倫海峽歷史古老
對面巴拿馬運河未免過窄
右手澳大利亞說是別有洞天
左手阿留申列嶼恰似踏腳石
啊 這大海 太平洋
新時代之搖籃 近世紀之祭壇

這首詩也將他的「臺灣中心論」顯露無遺。這首最近由呂興昌教授首次譯為中文發表，參看：呂興昌：〈吳新榮「震瀛詩集」初探〉，《賴和及其同時代的作家：日據時期臺灣文學國際學術會議》論文，1994 年 11 月 25-27 日，清華大學，新竹。

一個人坐在書房中，無所事事望南壁的地圖。終於理清思緒，完成「臺灣中心說」思考：

- 一、臺灣為東南亞最中心地，故可稱地理上的聖地。
- 二、臺灣之東為世界最大洋即太平洋，西為世界最大大陸即亞細亞洲。
- 三、北回歸線橫斷中部，北為溫帶，南為熱帶。
- 四、越東海，北控日本列島；越南海，南控南洋群島。
- 五、日本列島之北，朝鮮半島為大陸之左手；南洋群島之西，中南半島為大陸之右手。
- 六、朝鮮之北，接臨滿洲、蒙古；越南之西，接臨泰國、緬甸。
- 七、滿洲之北，為世界未開之地西伯利亞；緬甸之西，為世界寶庫印度。
- 八、若說山東半島與海南島是中國大陸的兩耳，則臺灣正是鼻子。
- 九、於此聖地，南北有新舊兩都兩地；又東半為山地，西半為平野。
- 十、他日新高港完成，則為東亞最大港；臺中可成東亞最大都市。

日據時代臺灣知識份子所懷抱的一種「臺灣中心論」，到了近年來獲得更明確的詮釋。已故東海大學哲學教授蔣年豐在1988年2月更在中國與世界的脈絡中，思考臺灣生命力的開

展，他說：²⁵

臺灣人的生命力不但可以解消國民黨的專權，也可以解消共產黨的專制。臺灣人的生命力先展現在經濟上，其次在政治上，最後在文化上；「壓不扁的玫瑰花」終究要盛開的。

他又認為：²⁶

與其將臺灣建立成一個新而獨立的國家，不如將中國建立成一個新而獨立的國家。臺灣人的生命中的確仰望著建立一個新而獨立的國家。但這個國家的成立應有世界史的意義，也就是這個國家的精神可以做為衡量歷史上人類之人文精神表現的標準。

這種以臺灣為中心的思考方式的出現，是數百年來臺灣人要求自由自主的歷史意識所長期積澱而成的。要求海峽兩岸在短期間內統一的「急統派」，由於未能深入瞭解臺灣人的「共同記憶」以及歷史意識，所以他們的主張難以獲得臺灣居民的普遍認同。

針對我在上文所說而為「急統派」所忽視的「臺灣主體性的覺醒」這項事實，有些讀者可能質疑：臺灣文化不是「悲情

²⁵ 蔣年豐：《臺灣人與新中國——給民進黨的一個行動哲學》（臺中：作者自印本，1988），頁9。

²⁶ 同上書，頁22。

文化、受害意識、族群意識、被出賣的恐懼等性格特徵的匯集」嗎？²⁷在政治上「臺灣的名字不只是自憐式的『亞細亞的孤兒』，更是客觀事實的『亞細亞的政治弱者』」，如何獨立自立？²⁸這一類的質疑，雖然可能在某些方面在歷史上可以找到某些佐證，但是可能並不完全契合當前臺灣的思想狀態。爲了進一步闡明這種看法，我們可以「亞細亞的孤兒」這個臺灣人的「自我形像」加以說明。

「亞細亞的孤兒」是日據時代臺灣著名文學家吳濁流所創作的小說的書名，但是，這個名詞卻很可以用來形容身處日本帝國主義統治之下的臺灣人的悲情命運，他們慘遭日本人的欺凌，但回到大陸卻又受到「祖國」同胞的歧視，形同實質的孤兒。吳濁流在他的回憶錄中對他在大陸的經驗有一段深刻的描寫，他說：²⁹

我以為只要能夠走出臺灣，就和飛出籠中的鳥一樣自由，可是現在的大陸，竟和臺灣一樣，背後有日本憲兵的眼睛在閃爍。在中國人這一邊，又把臺灣人視為日本間諜而不予信賴，處在這種境遇之下的臺灣人，決不願把自己的身分表露出來，往往說自己是福建人或廣東人，而在臺灣人同志之間卻用「蕃薯仔」這隱語。〔…〕

現在的臺灣人，和失去父母的孤兒一樣，在重慶這一邊

²⁷ 徐宗懋：《臺灣人論》（臺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有限公司，1993），頁 103。

²⁸ 同上書，頁 104。

²⁹ 吳濁流：《臺灣連翹》（臺北：前衛出版社，1989），頁 104 及 223。

也好，江偽政權這一邊也好，都同樣被視為「異己份子」，不僅不信賴臺灣人，甚至視為間諜。

日據時代在異族統治下的臺灣人，誠然是「亞細亞的孤兒」，充滿了所謂「悲情文化」與「受害意識」。但是，我們不要忘記：經過戰後 40 多年的經濟發展，這種「悲情文化」與「受害意識」的孤兒心態業已大部份滌除了。日據時代的「孤兒」已經長大，「從此奇男已丈夫」！現在的臺灣知識份子這樣重新詮釋「亞細亞的孤兒」這個概念：³⁰

亞細亞的孤兒 (orphan) 知道自立自主便是「我奮意識」 (consciousness of orphan)。亞細亞的孤兒的自立自主，不能只在文學與哲學上完成，還要新的社會與文化體制中完成。亞細亞孤兒的茁壯長大即涵蘊著新中國的建立。亞細亞孤兒這個「在地上爬的人」站得起來，世界各民族才站得起來。

「亞細亞的孤兒」已從日據時代的自怨自憐的悲情命運中奮起，邁向自立自主自強，為臺灣史、中國史及世界史開拓新境界。

總而言之，「急統派」人士的主張，完全忽略了近百年來臺灣歷史所孕育的歷史意識，以及從這種歷史意識中走向自立自主的新動向。

³⁰ 蔣年豐，前引書，頁 9。

四、「急獨派」的侷限：對中國近代歷史意識的忽視及其原因

如果「急統派」因為忽視近百年來臺灣歷史所孕育的追求民主的歷史意識，所以脫離臺灣的現實而難以被接受的話，那麼作為「急統派」的反命題的「急獨派」的主張是否就順理成章地可以成立了呢？很吊詭的是，「急獨派」竟也因為歷史意識的不夠深厚，所以未能正視近百年來中國歷史運命的挫折，及其所引起的民族主義意識的高漲這個問題。由於對民族主義問題的未能掌握，所以「急獨派」對未來海峽兩岸關係的看法，也難免脫離現實的困局。我們在下文的論述中分析以上這項看法。

主張臺灣應立即割斷中國大陸的糾纏以邁向獨立的人士，所提出理由不一而足，例如有人從政治立場著眼，主張臺灣為追求自由民主人權，必須割棄專制的中國的包袱；有人從經濟觀點，主張臺灣是亞洲太平洋經濟圈的一份子，不應被納入中國大陸型經濟體系之中。這些理由分別言之，均有其成立之根據。本文無暇就這些論據一一加以剖析。我只想從歷史意識這個特定角度，指出「急獨派」人士思考問題的侷限性在於：第一，他們對近百年來中國所遭受帝國主義之侵略史實較為陌生；第二，他們對於近百年來中華民族的挫折，及其所激發的狂熱的民族主義情緒較難理解；因此，他們未能扣緊近百年來中國大陸的歷史意識來思考海峽兩岸的未來。

第一，我們先分析以上所提出的第一個侷限性。多數臺灣人之所以難以深入近代中國命運的挫折及悲劇的心靈，實在是一種歷史的必然，因為自從公元 1895 年滿清割讓臺灣給日本之

後，臺灣人與中國大陸居民就由於歷史的斷裂，而走上了歷史的歧途，雙方人民並沒有分享共同的歷史經驗，因此缺乏共同的歷史記憶，也因此而形成了不同的「歷史性」(Historicality)與世界觀。

我們進一步從具體史實來觀察近百年來臺灣與大陸之間歷史的斷裂。20 世紀的中國，所經歷的是一個憂患的世紀。公元 1900 年，義和團以其激烈的排外主義包圍北京各國使館後，清廷向各國宣戰，接著八國聯軍攻佔北京城，次(1901)年，辛丑條約簽訂，西方列強對中國的侵凌達於高潮。1911 年爆發辛亥革命，推翻滿清，孫中山先生 1912 年在南京就任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大總統。但是，民國成立以來，繼踵而至的是一連串動亂歲月，1915 年袁世凱(容庵，1859-1916)稱帝、日本提出二十一條要求，進一步暴露侵華野心；1917 年，張勳(少軒，1854-1923)復辟，接著是軍閥混戰，1922 年第一次直奉戰爭，1924 年第二次直奉戰爭，使生靈塗炭，直到 1928 年北伐完成，中國才在形式上歸於統一。但日本軍閥侵華野心日益高漲，步步進逼，終在 1937 年 7 月 7 日，引爆蘆溝橋事件，中國全面對日抗戰。從 1937 年至 1945 年，中國歷經八年抗戰，人民流離失所，苦難遍嘗。抗戰勝利之後，卻又繼之以國共內戰，終於大陸政權易手。身經 20 世紀中國歷史變局而飄泊臺港的儒家學者徐復觀曾對這一段歷史悲劇，提出這樣一段證言：³¹

〔…〕我之所以拿起筆來寫文章，只因身經鉅變，不僅

³¹ 徐復觀：《學術與政治之間》(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0)，〈自序〉，頁 VI-VII。

親眼看到許多自以為是尊榮，偉大，驕傲，光輝的東西，一轉眼間便都跌得雲散煙銷，有同鼠肝蟲臂。並且還親眼看到無數的純樸無知的鄉農村嫗，無數的天真無邪的少女青年，有的根本不知今是何世，有的還未向這世界睜開眼睛；也都在一夜之間，變成待罪的羔羊，被交付末日的審判。在這審判中，作為人類最低本能的哭泣，呼號，作為人類最大尊嚴的良心，理性，都成為罪惡與羞辱，不值分文。而我的親友，家園，山河，大地，也都在一夜之間，永成隔世。凡這種種，並非歷史中的神話，而是一個人親身的經歷；則作為「蓋人心之靈，莫不有知」的我，對此一鉅變的前因後果，及此一鉅變之前途歸結，如何能不認真的去想，如何能不認真的去看，想了看了以後，在感嘆激盪的情懷中，如何能不把想到看到的千百分之一，傾訴於在同一遭際下的人們之前。所以我正式拿起筆來寫文章，是從民國卅八年開始。

{ ... }

徐復觀認為，1949年以前「中山先生所倡導的民主政治，不斷地受到阻擾，最後使整個大陸，淪入於極權政治的鐵幕而言。中國兩千年的專制，乃中華民族一切災禍的總根源」，³²但是，值得令人哀嘆的是，1949年大陸政權易手之後，中國人民在共黨統治之下，又歷經「反右」（1957-1958）、「大躍進」（1958-1960）、「文化大革命」（1966-1976）等一系列的浩劫，

³² 徐復觀；〈中國歷史運命的挫折〉，收入：《中國思想史論集》（臺北：臺灣學生書局），引文見 257。

至 1989 年 6 月 4 日天安門事件而達到一個高潮。以上所說近百年來在大陸的中國人民所經歷的是一連串的悲劇命運與民族的挫折，所以他們民族主義情緒高漲，使得民族主義仍是當前大陸的政治文化中的重要組成部份。他們較難以理解現代社會將個人生命的尊嚴、自由民主價值的追求置於國家認同之上的思考方式。因為百年來中華民族飽受外國帝國主義欺凌的歷史慘痛經驗，使他們深信民族解放先於個人的解放，國家的統一先於個人的自由。

但是，最近一百年來的臺灣則與中國大陸走在不同的歷史道路上。自從 1895 年日本佔領臺灣以後，早期武裝抗日運動此起彼落，1920 年代以後也有議會設置請願運動。但是從歷史角度來看，日據時代（1895-1945）是臺灣從傳統社會轉化為近代社會的關鍵時期。日本殖民當局固然剝削臺灣的各種資源，但是也積極從事各種建設，舉例言之，1911 年 12 月 1 日從基隆到打狗（高雄）鐵路夜間通車，1913 年 12 月 20 日起縱貫鐵路全線通車，1930 年 4 月 10 日建設長達 10 年（1920-1930）的嘉南大圳正式供水，1931 年高雄第二火力發電廠所開始供電。這些下層結構的建設，在相當的程度內奠定了臺灣邁向現代化的基礎，也使日據時代訪問臺灣的大陸人士印象深刻。例如，1911 年 3 月 24 日，20 世紀中國知識界的代表人物梁啟超（字卓如，號任公，1873-1929）從日本神戶來臺灣訪問，行前曾對他的臺灣之行發表一段說明：³³

吾茲行之動機，實緣頻年居此讀其新聞雜誌，咸稱其治

³³ 梁啟超：〈游臺灣書牘第一信〉，見氏著：《飲冰室文集》，卷 4，頁 14。

臺成績，未嘗不愀然有所動於中，謂同是日月，同是山川，而在人之所得，乃如是也。而數年以來，又往往獲交彼中一二遺老，則所聞又有異乎前，非親見又烏乎辨之，此茲行所以益不容已也。大抵茲行所亟欲調查之事項如下〔…〕五、吾國今復言殖產興業，要不能不以農政為始基，聞臺灣農政之修，冠絕全球，且其農政，事農習慣，多因我國，他山之石，宜莫良於斯。〔…〕十、臺灣前此舉行土地調查，備極周密，租稅之整理，其根本皆在於此，何以能行，而民不擾。又其所行之戶口調查，係適用最新技術，日人自誇為辦理極善，今者日本本國將行國勢調查，即以為法，欲觀其實際詳情如何？

梁啟超所感嘆的：「同是日月，同是山川〔…〕在人之所得乃如是也。」，最可以顯示 1985 年以後臺灣在基本建設上的進步。日本人建設臺灣的成績，也使 1935 年來臺北參觀「始政四十周年紀念博覽會」的福建省政府主席陳儀（1883-1950）大為驚訝。為了吸收日本人統治下的「臺灣經驗」，陳儀並在同年邀請當時設計嘉南大圳的日本工程師八田與一（1886-1942），前往福建考察水利設施，擬定「福建省開發計劃」。³⁴經過日本統治時代臺灣在基本建設上的進展，以及農會、水利會等農民組織的完善，也使得 1949 年從大陸來臺的中美中國農村復興委員會的專家，對臺灣的社會經濟狀況大加稱讚，《中國農村復興聯

³⁴ 參考古川勝三：《臺灣を愛した日本人——「嘉南大圳の父」八田與一の生涯》（松山市：青葉圖書，1989），頁 260-261。

合委員會工作報告》這樣說：³⁵

日本人治臺灣不用重稅政策暴斂人民財富，以避免人民怨恨，其經濟來源則多取自數種重要日用品之專賣，例如、酒、菸、鹽、樟腦。此類專賣品之收入一部份用在教育、修路及建設現代化城市之用，對於人民智識之開發，運輸交通之改進，公共企業之補助均有關係，使農工業均日有進步。

以上這些歷史見證者所提出的第一手觀察，大致與事實相去不遠，都可以說明 20 世紀以後臺灣在與中國大陸歷史「斷裂」之後，快速地邁向現代化的歷程。到了 1945 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臺灣光復之後，1950 年代國民政府推動土地改革政策，成功地創造了農村自耕農階層，成為社會政治穩定的重要基礎。土地改革的成功，提高了農業的生產力，奠定了 1960 年代以後工業起飛的基礎。1966 年 12 月 3 日高雄加工出口區開始營運，象徵臺灣以出口為導向的初級加工業的發展。從 1968-1969 年度開始，「九年國民教育」政策實施，又使接受中等教育以上的人口，快速增加，使臺灣社會中的中智階段更形茁壯。更重要的是，1987 年 7 月戒嚴令廢除以後，臺灣更快速地邁向民主化。近年來，以投票表示人民的意志，已經成為臺灣人民的政治生活方式。在華人社會中，臺灣是最成功而最全面性向民主

³⁵ 《中國農村復興聯合委員會工作報告》，1948 年 10 月 1 日至 1950 年 2 月 15 日（臺北：農復會，1950），頁 12。

社會轉化的個案，具有重要的歷史意義。³⁶

其次，由於以上所說的最近百餘年來，臺灣與中國大陸之間「歷史的斷裂」，所以，臺灣的居民與大陸的居民的「歷史性」(Hisoricality) 差異甚大，使臺灣人民對大陸人民的民族主義情緒難以有深刻的理解與掌握。我們引用史料進一步說明最近一百多年，大陸居民對臺灣的看法。

一言以蔽之，近百年來大陸居民最大的憂懼就是臺灣落入西方帝國主義者之手。這種憂懼的態度普遍出現在清朝皇帝、官僚，以及知識份子之間。舉例言之，清宣宗(在位於 1841-1850 年)在道光 21 年(1841 年)12 月 8 日，就有一道上諭很具體地顯示這種憂懼之情：³⁷

前據達洪阿等奏：逆夷滋擾，臺郡官兵擊沉船隻，奪獲器械，擒斬夷匪多名，當有旨諭令該總兵等，嚴飭在事文武，添派兵勇，嚴密防範，並諭令王得祿移駐臺灣，協同勦辦。嗣因日久，未據續報，復諭令怡良等，確探馳奏，迄今又將匝月，朕心實深念。臺灣為閩海要區，向係該夷垂涎之地，此次駛入夷船，復經該總兵等殲剿，難保無匪船闖入，冀圖報復。

³⁶ 參考拙著：Chun-chieh Huang, *Taiwan in Transformation, 1895-2005* (New Brunswick and London: Transaction Publishers, 2006).

³⁷ 姚瑩：〈遵旨覆奏籌議臺灣防務摺〉，(道光 23 年 2 月 16 日)，收入：胡秋原主編：《近代中國對西方及列強認識資料彙編》(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1)，第 1 輯第 1 分冊，頁 368。

在道光皇帝眼中，「臺灣為閩海要區，向係該夷垂涎之地」，恐懼失去臺灣之情洋溢於字裡行間。這種想法也瀰漫於官僚之間，例如光緒年間的福建巡撫丁日昌（1823-1882）在奏摺中就憂心於外國列強對臺灣的窺伺，丁日昌說：³⁸

蓋自通商以來，法以安南為口岸、英以香港為口岸、俄以黑龍江外為口岸，德國來華經商船隻雖不及英而多於美、法、俄諸國數倍，獨無口岸可以泊船，故其覬覦臺灣較之他國為尤甚。此次播弄日人開釁，無非存「鷸蚌相持，漁人得利」之見。故中國自強之計一日不堅，則彼族窺伺之心一日不息。

在丁日昌眼中，法國、英國、俄國、德國這些西方列強，野心勃勃，德國「覬覦臺灣較之他國為尤甚」。

從清代中葉以來，不僅皇帝或官僚深以失去臺灣為隱憂，一般知識份子也表現強烈的這種隱憂。清初的梅文鼎（字定九，號勿庵，1633-1721）就是一個例子。梅文鼎雖然以科學史研究著稱，但是對臺灣時事卻頗為關懷，他的「武林郁滄波以《裨海紀遊》見示得三十韻」詩，也透露這種深沉的隱憂：³⁹

矧伊西極戎，波濤狎阻兵，

³⁸ 丁日昌：〈閩撫丁日昌奏西班牙窺伺臺灣情形片〉，收入《清季外交史料選輯》（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4，臺灣文獻叢刊），頁16-17。

³⁹ 梅文鼎：《績學堂文鈔》（日本內閣文庫藏清刊本）卷4，及頁5下半頁-7上半頁。

堅忍濟機猾，澤國恣饕并。

呂宋實殷鑒，巴黎虐使令，

盤踞連海南，闖伺形已成。

梅文鼎對於臺灣島處於列強的闖伺形勢之中的狀況憂心忡忡，這種憂心情緒在相當程度之內可以反映中國大陸知識份子的一般看法。這種看法直至今日仍是如此。

以上所說的清代皇帝、官僚以及知識份子對「列強侵佔臺灣」的深沉憂慮，雖然以不同的論述方式提出，但是他們的言論都共同建立在民族主義的基礎上，而且值得注意的是：這種民族主義同時兼具「文化的民族主義」與「政治的民族主義」兩個面向，而且兩者合而為一。他們認為，臺灣與大陸既同屬「文化中國」之區域，自應成為「政治中國」之不可分割之部份。這種想法到了 20 世紀以後，隨著西方列強對中國侵凌之日甚一日而快速加強。於是，大陸居民在民族主義情緒之下，就難以理解臺灣居民追求自由民主獨立，以及認為個人尊嚴高於國家認同的價值觀念。

相對而言，由於「歷史的斷裂」，所以臺灣的急獨派人士最大的問題在於：他們未能正視中國大陸居民近百年民族主義情緒的挫折，也因此未能掌握民族主義因素在海峽兩岸關係互動中的潛在危險性。由於這種局限性，所以急獨派人士有時不免陷入過度膨脹臺灣主體性的危機之中，失去正確掌握兩岸關係的契機。

綜合本節所說，「急獨派」人士由於臺灣與大陸之間歷史的「斷裂」而對於近代中國歷史意識有所忽略，他們未能正確理

解民族主義在華人政治文化中的重要作用，因此，他們對海峽兩岸未來關係的主張不免有所障蔽。

五、兩岸關係的新展望：從歷史／人民的立場出發

從上文第3節與第4節的分析，我們可以發現：現階段「急統派」與「急獨派」人士，對於臺灣與大陸未來關係所提出的方案，雖然互相牴牾，甚至水火不容，但是，兩派主張卻有異同之中，那就是他們都墮入一種「非歷史的或反歷史的謬誤」(the fallacy of ahistoricity／anti-historicity)而不自知。雙方若干人士思考臺灣與大陸的關係，常常從「非歷史的」(ahistorical)或「反歷史的」(anti-historical)立場，將「統一」或「獨立」當作抽離於具體歷史情境或條件的意識形態來思考，於是，「統一」或「獨立」乃成爲不具「時間性」(temporality)與「空間性」(spatiality)的抽象概念，脫離人民的具體而現實的生活而存在。這種從抽象而不是從具體出發的思考方式，在雙方人士在論述海峽兩岸關係時常常出現而成爲雙方的共同特質。

由於這種思考上的盲點，所以「急獨派」和「急統派」人士雖然用心良善，但是常常由於脫離現實生活而欠缺具體性，未能針對現實狀況而一針見血地提出對應策略。這種思考上的盲點，使雙方人士未能將他們所提出的策略，置於具體的人民生活的脈絡中加以衡量。他們常常要求具體的人民生活服從於抽象的意識形態，並且爲意識形態服務。

針對以上這種思考問題的盲點，我們必須將「非歷史的／反歷史的」立場轉化爲「歷史的」立場。所謂從「歷史的」立

場來看問題，就是將「統一／獨立」問題放在具體的臺灣歷史脈絡中加以考量。之所以必須放在臺灣歷史脈絡中考量，乃是因為「統一／獨立」這個問題首先是以臺灣地區兩千多萬居民作為對象，而作為臺灣歷史發展中的一個重要問題，而被提出的；所以，我們必須從臺灣史的具體脈絡中考量這個問題。

我們在本文第 1 節曾對臺灣史提出一種解釋，認為 4 百年來臺灣史的主題之一在於臺灣對中原的「離心力」與「向心力」之間的拉鋸戰。這兩種力量之所以在臺灣史上不斷地拉鋸，乃是因為從大陸移民臺灣的人民要追求自己心目中的福祉。有的人認為「人民的福祉」乃是在於回歸原鄉，與大陸合而為一；有的人則認為「人民的福祉」乃是徹底脫離原鄉，建立新而獨立的家國。因此，所謂臺灣史中的「離心力」與「向心力」，在互不相容的表相之下，在深層結構上又潛藏著巨大的共同質素——這就是人民的意願與福祉。經過以上的分析，我們可以發現，所謂「歷史的立場」，也就是「人民的立場」。是的，人民是創造歷史的動力，只有創造歷史的人才是歷史的主人，而歷史所形塑的意識形態並不是歷史的主人。

我之所以強調從「人民的意願」這個立場出發，除了這是臺灣歷史所啓示我們思考這個問題的原則之外，這也是中國幾千年來有良心的儒家學者討論政治問題時一貫的立場。這種尊重人民意願關懷人民福祉的立場，早在戰國時代（463-222 B.C.）就為孟子所揭出。孟子說：

孟子曰：「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是故得乎丘民而為天子，得乎天子為諸侯，得乎諸侯為大夫。諸侯危社稷，則變置。犧牲既成，粢盛既潔，祭祀以時，然而早

乾水溢，則變置社稷。」(《孟子·盡心下·14》)

在儒家的政治思想中，人民永遠是政治的主體，一切的政策或措施，都必須以是否符合民意作為取捨之判準，孟子說：

國君進賢，如不得已，將使卑踰尊，疏喻戚，可不慎與？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聽；諸大夫皆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左右皆曰可殺，勿聽；諸大夫皆曰可殺，勿聽；國人皆曰可殺，然後察之；見可殺焉，然後殺之。故曰，國人殺之也。如此，然後可以為民父母。(《孟子·梁惠王下·2》)

這種政事取決於人民的「民本政治」雖然與現代的「民主政治」尚有相當大的差距，但是古典儒家所提示的「以民為本」的政治理念，與現代民主政治在精神上是相通的，而且對即將邁向 21 世紀的臺灣也有深刻的啓示作用。⁴⁰

⁴⁰ 近年來，臺灣的民主化發展，基本上是走在歐美近幾百年民主政治的軌跡上，將政治領域視之為諸般階級、社群或族群的利益之衝突以及協調的場所。政治不再是古代中國儒家所想像的「道德的社區」，政治人物也不再是人民道德福祉的創造者（儘管他們常常打著道德的旗幟，也呼喊著道德的語言），而是利益的追求者與協調者。建立在這種理論基礎之上的臺灣民主政治，常常將「個人」與「群體」視為不可協調的敵對的存在。近年來，臺灣社會中個人主體意識的高度覺醒，相對於中國歷史上個人主體性受社會性的壓抑與牽制而言，固然有其彌足珍貴的意義，但是快速的民主化卻將這種急速成長的個人主義意識，導向一種不甚健全的「個人主義」的病

如果扣緊「人民的意願與福祉」來看臺灣與大陸未來關係這個問題，我們就會發現這個問題並無一成不變的答案。凡是企圖以絕對而抽象的意識形態強加諸人民的意願之上的提案，恐怕都將膠柱鼓瑟，陷人民於痛苦之中。我認為，這個問題必須從「尊重人民的意願與福祉」的立場出發，隨著時間的進展而調整其答案。《莊子·天運篇》云：

禮義法度者，應時而變者也。

郭象(A.D.? - 312)註這句話最能探驪得珠，得其肯綮，郭象說：

彼以為美，而此或以為惡，故當應時而變，然後皆適也。

誠然，「時間感」是我們處理兩岸關係時最為重要的憑藉之一。我們只有在「時間」的變遷之中，深深掌握「人民的意願」，才能比較有效地處理這個問題。

那麼，從「歷史的／人民的立場」出發，應如何具體地處理兩岸關係這個問題呢？近年來，從上述立場出發而對這個問

態。現階段的臺灣，正處於一種「眾多主體覺醒、並立、衝突，但缺乏法治秩序」之狀態。用宋明儒的話來說，就是「氣」亂竄而不受「理」駕御之情況。我認為，先秦儒家之「連續性」觀點，可以針對二十一世紀臺灣的民主政治發揮滋潤的作用，在「個人主體性」快速覺醒的新時代中，使「個人」與「社會」的對立能稍微降低；也可以在二十一世紀臺灣經濟發展的過中，稍稍降低人與人以及人與自然的疏離感，值得我們重視。參考黃俊傑：〈儒家傳統與廿一世紀臺灣的展望〉，《鵝湖學誌》第10期（1993年6月），頁1-28，收入本書第6章；及C.C. Huang and K.M. Wu, "Taiwan and the Confucian Aspiration: Toward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in Stevan Harrell and Chun-chieh Huang et. al. eds. *Cultural Change in Postwar Taiwan*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1994), pp.1-18.

題討論較為明晰的是沈君山（1932-），他說：⁴¹

站在臺灣的立場來看臺灣的未來，來看臺灣和大陸間的關係，要從「以民為本」的原則出發，分析這兩個地區間共同的利益和個別的矛盾，而兼顧目前的處境和未來的期望。假如共同的利益超過個別的矛盾，則應求統一，反之，則宜各自發展，也就是獨立。在我看來，許多長期的因素，如民族的共同性，包括血緣、風俗、語言，如經濟發展上的互補性，如歷史文化上的認同感等等，這兩個地區都無對立的矛盾而只有共同的利益。現在阻礙統一的因素，是生活水準、價值觀念、意識形態、經濟和政治的制度等等。這些都是和老百姓最切身有關，也是最最短暫的，會隨科技的發展、歷史的演進而改變。所以我一直把統一當做長期目標。但在一步步走向這個目標時，必須注意兩點：第一、不損害臺灣一千七百萬人民的幸福；第二、必須盡其在我的影響大陸，使大陸也一步步的走向民主和自由。

以上這種提議，對「臺灣主體性」與「人民的意願」都給予絕對的尊重，比較符合臺灣史的基本動向，雖然其中「把統一當做長期目標」這句話中的「長期」到底是數十年或數百年或更久，可能引起不同人士的爭議，但是這個問題仍必須在「時間」的流變中來解決，而沒有先驗而固定的答案。

⁴¹ 沈君山：《尋津集—從革新保臺到一國兩治》（臺北：遠流出版事業公司，1989），頁 91-92。

六、結論

從歷史上看，臺灣是一個世界經濟與文化交流的中心，早自 16 世紀開始即已成為近代史上西歐各國爭取之基地，⁴²與西方文化之接觸甚早。在荷據時期，臺灣已成為荷蘭人將中國之商品輸往巴達維亞、日本、荷蘭及東印度各地商館之貿易中心。⁴³尤有進者，近 4 百年來的臺灣一直對中國大陸具有舉足輕重的影響。20 世紀著名的史學家陳寅恪（1890-1969）說：「鄭氏父子之興起，非僅由武力，而經濟方面，即當時中國與外洋通商貿易之關係有以致之。明南都傾覆，延平一系猶能繼續朱氏之殘餘，幾達 40 年之久，絕非偶然。自飛黃（芝龍）大木（成功）父子之後，閩海東南之地，至今三百餘年，雖累經人事之遷易，然實以一隅繫全國之輕重。治史之君子，溯源追始，究世變之所由，不可不於此點注意及之也。」⁴⁴ 這一段話很正確地說明了臺灣地位的重要性。

入 21 世紀的東亞世界，所面對的重大問題之一就是臺灣與中國大陸關係的調整。本文從歷史意識這個角度，分析當前對

⁴² 參考曹永和：〈荷蘭與西班牙佔據時期的臺灣〉，收入氏著，《臺灣早期歷史研究》，頁 25-44。

⁴³ 曹永和：〈荷蘭時期臺灣開發史略〉，收入氏著：《臺灣早歷史研究》，頁 45-67，尤其是頁 66。

⁴⁴ 陳寅恪：《柳如是別傳》，收入：《陳寅恪先生文集》，（臺北：里仁書局，1981）（五），頁 77。

這個問題所提出的「急統」與「急獨」兩種主張，認為兩者都有其歷史思維的盲點。「急統派」未能掌握 4 百年來移民臺灣的漢人追求自由自主的理想；而「急獨派」則忽略近百年來中國大陸人民所經歷的民族挫折，以及隨之而興起的民族主義情緒。雙方人士這種歷史思維的盲點，使得他們對臺灣與大陸未來關係的思考均有嚴重的障蔽。

我們在分析以上兩種主張的歷史意識的欠缺之後，提議從「歷史的／人民的立場」出發，思考並安排這個問題，將這個問題置於臺灣歷史的具體脈絡中加以考量，拓展歷史思維的廣度與歷史意識的深度，在時間深度之中尊重「人民的意願」，跳出「統一／獨立」的二分格局，在時間的變遷之中，掌握解決問題的契機。（1994 年 5 月 1 日初稿，1994 年 11 月 30 日修訂，本文初稿曾刊於：中國歷史上的分與合學術討論會籌備委員會編：《中國歷史上的分與合學術討論會論文集》（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95），頁 385-414）